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陈绍辉. 沉寂与开新:秦汉时期楚、越两地学术文化交流述论[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1): 53-58.

# 沉寂与开新:秦汉时期楚、越两地学术文化交流述论

陈绍辉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秦汉时期,楚、越两地文化交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和深化。所不同的是,越地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楚地的道家思想、楚辞创作和重史传统,在哲学思想、经学研究、汉赋创作和史著编撰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充满创新与活力。楚地在楚辞研究和古文经学研究上颇有成就,在其他方面则少有建树,略显沉寂和乏力。

**关键词:**秦汉时期;楚文化;越文化

**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1-0053-06

秦汉时期,由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催生出来的学术思想经学化及主流化,并未对地处南方的楚、越两地带来过多的直接影响。楚、越两地的学术与思想,仍然遵循着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前行。产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不仅在越地继续传播,广为传承,而且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越地学人进行学术研究和哲学批判的思想武器,越地也因此更多地传承和涵化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进一步丰富和强化了地域特色。与之相反,楚地则逐渐丧失其鲜明的本土性,发展了更多的汉文化共性。综观秦汉一代,楚地文化明显沉寂,活力不足,而越地文化则相对生动,开新有余。

## 一、哲学

秦汉时期,作为道家思想产生之地的故楚之地,在哲学思想上几无建树,先秦时期那种灿若星河、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已荡然无存,令人窒息和困惑。吴越地区则在长期沉默之后,因王充和《论衡》如彗星一般的横空出世,完成了发展道家思想的历史任务,将中国哲学的发展推入一个新的阶段。章太炎指出:“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sup>[1](P444)</sup>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少孤,乡里称孝。后游学京师,受业太学,师从著名史家班彪,受班氏道家黄老学说影响颇大,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好论说而深求实理,很好地继承了道家疾伪尚真的传统学风。王充一生勤于著述,可惜的是《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皆已散佚,唯有《论衡》(今本84篇)独存。

东汉前期,意识形态领域内充斥着虚妄迷信,学术思想领域里则是神学化泛滥成灾,虚妄不实风气浓厚,甚嚣尘上。王充认为已到了“是反为非,虚转为实”<sup>[2](P571)</sup>、“浮妄虚伪,没夺正是”<sup>[2](P572)</sup>的绝境,遂拍案而起,奋笔直书,对此展开猛烈批判,“订其真伪,辨其虚实”,揭发其欺骗本质。《论衡》就是为揭露和批判这种虚妄学术而作。王充自言:“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论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sup>[2](P569)</sup>又说:“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论衡者,论之平也”<sup>[2](P578-579)</sup>。并以“疾虚妄”一语概括全书的中心内容,公开宣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

收稿日期:2020-10-10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荆楚文化史”(2014ZD015);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化强省建设的目标、任务、路径、措施研究”(HBSK2018ZDWT006)

作者简介:陈绍辉(1973-),男,湖北鄂州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楚文化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sup>[2](P413)</sup>

正因为,《论衡》从篇名到内容,处处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和战斗精神。《问孔》《刺孟》等是对儒家老祖宗的批判,《书虚》《道虚》《语增》《儒增》等是对当时流行伪书的批判,《寒温》《谴告》是对俗儒天人感应说的批判,《讲瑞》《指瑞》等是对祥瑞思想的批判,《死伪》《纪妖》《订鬼》《四讳》是对一般社会迷信的批判。今有学者统计,《论衡》一书,使用“实”字,包括“非实”“不实”“失实”等,共431次;用“虚”字,包括“不虚”,共169次;用“妄”字,共59次;用“误”字,共11次;用“信”字,包括“不可信”,共17次;用“伪”字,共8次,用“非也”,共17次。前后使用“实”“非实”“不实”“失实”“虚”“不虚”“妄”“误”“信”“不可信”“伪”“非也”等等这些带有极强的是非曲直观念和感情色彩的字眼,总共高达741次。足见其批判锋芒之犀利,战斗性之强劲。

“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sup>[3](P1667)</sup>如果说,吴越之地好勇争胜的民族性格与地方民风孕育和铸就了王充敢于直面现实,勇于针砭批判,不惮以身相许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创新意识,那么,楚文化中的道家之学及黄老思想则为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武器和坚实的哲学基础,是滋养王充思想学术的源头活水。

“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sup>[2](P369)</sup>王充在《论衡》中明确表达了对道家始祖老子和黄老之学先师文子的敬仰之情,并公开宣称自己用以批判神学化儒学虚妄奸伪的理论武器和赖以订真辩实的哲学基础,就是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表白自己是“依道家论之”<sup>[2](P264)</sup>,肯定“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sup>[2](P294)</sup>,强调自己关于天道的阐论“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sup>[2](P271)</sup>。他认为道家思想是“夫天道,自然也,无为”<sup>[2](P294)</sup>,对“道生万物”作了“万物之生,皆禀元气”<sup>[2](P455)</sup>的完整表述。需要关注的是,王充的思想虽然“依道家”立论,但并非只是先秦道家思想的简单翻版。他并不满足于以往道家学者的阐述,认为以往“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sup>[2](P267)</sup>,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作了新的诠释和发挥,充满了时代的色彩。

西汉时期,政治统一,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向前大踏步迈进。当时中国在诸如天文、历法、算学、农学、医学等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王充

在《论衡》中广泛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大量的事实作为论据,充分阐发其元气自然发生论,明确强调了宇宙本体的物质性和宇宙生成的自发性,从而使他的哲学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王充推崇黄老之学的集成之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称“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sup>[2](P559)</sup>。王充的许多思想,也直接源自这两本书。但他的宇宙观则排除了两书中所含的有神论杂质,从而将道家宇宙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sup>[4](P234)</sup>

以天道自然的宇宙观为哲学基础,王充对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的谶纬神学进行了全面批判。他指出,世间一切均非上天有意安排的,天与地一样,无神秘可言。日月经天,万物生长,都是自然而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sup>[2](P504)</sup>，“天地合气,万物自生”<sup>[2](P364)</sup>，“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sup>[2](P70)</sup>,故“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sup>[2](P145)</sup>。他强调指出:“夫天无为,故不言。灾,时至,气自为之。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sup>[2](P370)</sup>，“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sup>[2](P294)</sup>。春温夏暑,秋凉冬寒,灾异之变等,全都是合乎规律的自然现象,与帝王失道之败没有直接关系。尽管自然变化能够影响人,但“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sup>[2](P303)</sup>。天地之动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sup>[2](P308)</sup>。通过对神学化儒学的理论体系的层层批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实质:“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sup>[2](P300)</sup>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的神学化儒学,只是儒者主观编造的虚妄学说,而“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sup>[2](P299)</sup>,也是儒生将其学说神学化,意图借助虚幻的天神的权威来推行其主张,威慑愚昧的世人。

从天道自然、元气化物的宇宙观出发,王充对当世盛行的鬼神崇拜、神仙方术、淫祀、禁忌等种种迷信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他发挥道家的精气说和桓谭的形神论,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sup>[2](P414)</sup>，“人之死,犹火之灭也”<sup>[2](P417)</sup>，“火灭不能复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复为鬼,明矣”<sup>[2](P416)</sup>,故“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语言,则不能害人矣”<sup>[2](P419)</sup>。他强调,物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冬而释,人竟百岁而

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释乎?”<sup>[2](P155)</sup>鬼神乌有,求仙无异于痴人说梦。“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不能寿之为仙。”<sup>[2](P146)</sup>对于社会上流行的淫祀之风和厚葬恶习,王充也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百祀无鬼,死人无知”,“祭之无福,不祭无祸”<sup>[2](P477)</sup>，“死人无知,厚葬无益”<sup>[2](P462)</sup>。

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王充《论衡》即总揽百家之学精心所著之文,显示出对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融会创新之学风的继承和发扬。尽管王充受时代局限而存在形而上学的弊病,所著的《论衡》追求无所不包而造成思想体系中的一些矛盾,但其哲学体现了道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汉代的最高理论水平,完成了道家长期从事的否定神学、确立天道自然哲学的崇高地位的任务。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神学化儒学的消解和汉末学术风气的转变——由皓首穷经、烦琐释经转变为融合儒道、兼采百家,而且为深化和衍化道家思想的魏晋玄学的兴起开拓了道路。<sup>[4](P239)</sup>

## 二、经学

秦汉时期的学术,首推经学,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包含着多种学问。西汉以今文经学为主流,东汉以古文经学为主流。前者重义理,后者专训诂。<sup>[5](P140)</sup>作为故楚之地,楚、越二地流行的是传承本土道家思想而来的黄老之说,经学则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外来之学,因此,经学主要是由一些任职或流寓本地的外地经学名儒在这一地区授业或治学而逐渐传播开来。

在传播的时间上,楚、越二地大致相同,都是从西汉后期开始的。楚地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刘昆和郅恽。刘昆,陈留东昏人,精通《易》学。王莽时期,他在家乡讲学,常有弟子五百多人。后遭到王莽迫害,南逃至江陵,继续以讲经为生。刘秀得知后,先是任命他为江陵县令,后又让他入宫教授诸皇子。郅恽,汝南西平人,精通《韩诗》《严氏春秋》,通晓天文历数。建武初年客居江夏教授,著书8篇。越地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鲁伯、孙张等。鲁伯,琅琊人,曾任会稽太守,是《易经》施氏学的重要人物。孙张,平陵人,曾任扬州牧,是士孙氏经学的代表。曾任广陵太傅的山阳人张无故与曾任丹阳太守的张驯,是《尚书》小夏侯氏学的重要人物,而曾任扬州刺史的欧阳歙,则是《尚书》欧阳氏学的重要人物。

东汉中后期,荆楚地区经学名师日渐增多。江夏的黄香、黄琼、黄琬几代,都是东汉时期的著名人

物。黄香自小以至孝著称,又“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sup>[6](P2614)</sup>,在当时名气很大,京师有“天下无双,江夏黄童”<sup>[6](P2614)</sup>之语,汉章帝曾亲自以此语向群臣介绍他。黄香子琼,被称赞为“耽道乐术,清亮自然,被褐怀宝,含味经籍,又果于从政,明达变复”<sup>[6](P1070)</sup>。黄琼孙黄琬,也是天下名士。南郡华容人胡广起家于安帝时,他被时任南郡太守法雄的儿子法真相中,法雄相信他儿子的眼力,“遂举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sup>[6](P1505)</sup>。顺、桓年间,南阳宛人赵康,“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sup>[6](P1463)</sup>。名士朱穆,年五十,奉书称弟子,“及康歿,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sup>[6](P1463)</sup>。扶风茂陵人马融,系东汉中期晚期的硕儒,为举国所宗,经学大师郑玄、卢植均出自其门下。他曾长期在荆州等地治学讲经,对魏晋风度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后汉书·马融传》曰:“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sup>[6](P1972)</sup>今湖北荆州市荆州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土台,俗称“老鸦台”,亦名“绛帐台”,相传是他当年讲学之处。

降至汉末,刘表在荆州起立学校,设立学官,延揽名儒从事经学讲授,集合儒生开展经学研究。因有宋忠、颖容、谢该等一批博学鸿儒执教,前来求学的全国学子蜂拥而至,荆州州学规模空前,盛极一时,成为当时唯一的官学。著名文学家王粲在《荆州文学记官志》中描述道:“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闾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接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sup>[7](P693)</sup>《刘镇南碑》载:“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海,闫闫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sup>[8](P1362)</sup>

自古以来,楚、越两地文化交流就比较密切频繁,尤其是自东汉初期起,吴越地区更是兴起千里游学之风。如会稽的顾李,曾赴豫章师事程曾;会稽的赵晔,更是远赴犍为资中,受业于杜抚。荆州州学如此兴盛,前来求学的越地士人必定不少。

学者指出,橘逾淮则变枳,人人乡宜随俗,学术也如此。任何学术,一旦传入荆楚,就会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乃至别开生面。<sup>[5](P142)</sup>

东汉一代古文经学大师辈出,如贾逵、许慎、马融等,表现出强大的活力,但古文经一直未能取得官学地位,荆州官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在

刘表开办的州学和组织的经学研究中,集中了许多当时一流的古文经学家,宋忠、司马徽、颖容、谢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这些著名学者在荆州引经作注,聚众讲学,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春秋》等这些两汉时期不登官学大雅之堂的经典,不仅首先在割据的荆州取得了正宗地位,而且随着这些学者的著作广为流传和生徒的广泛散播,荆州的学术得以流播四方,促成了荆州学派的形成,对当时其他地区乃至后世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上承两汉经学,下启魏晋玄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当汉献帝建安初年,中国本土的经学……而大江以南,远及江东巴蜀,并从荆州。”<sup>[9]</sup> 汤用彤先生明确指出:“我们回溯魏晋思潮的源头,当然要从汉末三国时荆州一派《易》学……讲起。”<sup>[10](P304)</sup> 开创魏晋玄学的王弼,“实际上就是上承荆州一派易学‘新经义’的大师”<sup>[11](P761)</sup>。可以说,刘表的官学为未来玄学的兴起作了人才和学理上的准备。<sup>[12](P471)</sup>

如前所说,任何学术,一旦传入荆楚,就会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乃至别开生面。这一论断,对于吴越之地也是很适用的。

东汉时期,越地学者一方面传承西汉传统的解经方法,另一方面大胆突破成规,另辟蹊径,推陈出新,抒发己见,令人耳目一新。他们的经学著作,从作品的命名到研究的内容,都与北方旨意情趣不同,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比如,赵晔所著《诗细历神渊》,仅从名称来看,神学化色彩严重,颇像是一部纬书,但从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一部经学著作。《后汉书·赵晔传》载:“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sup>[6](P2575)</sup> 如前所述,《论衡》是一部充满战斗性的专门批判谶纬学说的哲学著作。蔡邕读完《诗细》之后,认为其思辨性超过《论衡》。由此可以推断,《诗细》绝非一部纬书,而应是一部研究《诗经》的学术性著作。由此不难看出,东汉时期吴越学人在经学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和独特贡献。<sup>[13]</sup> 正因如此,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大呼:“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箴)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sup>[2](P566)</sup>

### 三、史学

先秦时期,楚人有着突出的历史意识和鲜明的历史精神。他们不仅注意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编

写和保存,而且对于历史文献的作用有深刻认识,并注重发挥它们的作用。据文献记载,楚人不仅拥有《春秋》《令》《语》《世》《训典》等中原历史典籍,而且编著有自己的国史《杻杙》。学者指出,楚人申叔时论教导太子,重历史教育,在申叔时所说的9种书中,史书占了半数以上。楚人重史这一优良传统,为先秦时期长江文化之一奇葩,对后世史学有很大影响。秦汉之后,历史精神、历史教育和以史辅政等之所以能有长足的发展和弘扬,与楚人重史有极大关系。楚人重史所产生的这一影响和辐射作用,丰富了整个长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sup>[14]</sup>

秦汉时期,深受楚文化浸润和影响的越人,继承和发扬了楚文化这一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积极编著了诸多历史典籍,在地方史学方面有着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袁康、吴平二人共同完成的《越绝书》,赵晔一人独立完成的《吴越春秋》,以及杨方的《吴越春秋削繁》、皇甫遵的《吴越春秋传》、周树的《洞历》等。其中《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基本保存下来,是现存浙人所著浙江最早的史书,堪称浙江史学的滥觞。

《越绝书》共15卷,25篇,现存19篇,余散佚。《四库全书总目》等根据书末隐语,定为东稽人袁康撰、吴平校定。一般认为,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战国时人所为,汉人附益之,东汉时袁康、吴平整理而成,是为先秦吴越先贤所著《越绝》所作的传。它主要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二国交兵争霸的史事,还包括吴越山川、湖泊、都邑、道路、物产、亭台、宗庙等的记载。

《吴越春秋》为东汉初著名学者、会稽山阴人赵晔所著。原12卷,后经晋杨方刊削、皇甫遵改定成10卷。成书时间大约与《越绝书》相当。前5卷记吴国历史,后5卷记越国历史,比《越绝书》更完整、系统地记载和反映了吴越民族起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全过程,并对古吴越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化、风俗民情、生活方式以及信仰迷信等社会风尚,也有较多的记载和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学者指出:“二书的作者都试图以老庄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解读吴越争霸这段历史,这一做法虽本原于《国语》《左传》《史记》,但他们自觉地强化了这一观念。”<sup>[15]</sup> 究其原因,当是“道家文化在吴越之地迅速传播发展,成为吴越文化的重要内容,使吴越文化由轻死易发变为风流旷达,产生了质的转变,以致后世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道家文化

虽发端于楚,但其基本精神却一直保留于吴越文化之中”<sup>[15]</sup>。《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两部地方史学著作的完成,标志着吴越区域文化的复兴,其对吴、越、楚三国历史的记载,也使吴越之地被楚文化覆盖的历史得到了法典化的确认。<sup>[16]</sup>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实际上就是楚、越文化深层次融合的结晶。

#### 四、文学

秦汉时期,楚、越地区的文学名家和文学作品的数量都远逊于北方,但二地的文学也自有其优势和特色。总体来说,楚地在文学创作上平淡无奇,但在文学研究上成就颇丰;越地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声有色,在文学理论上也颇有建树。

秦燔诗书,禁学坑儒,故“秦世不文”<sup>[17](P26)</sup>。秦之文章,大都出自楚人李斯之手,“故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sup>[18](P382)</sup>,故有秦一代,文学方面成就不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否定荆楚和吴越地区之间的文学交流。

秦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多次巡行全国,每次都命李斯草拟文辞,刻石纪念。这些碑铭刻石,虽是歌功颂德之词,但也言简意赅,褒扬充分,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秦代文学的一些气息。作为较早的功德碑铭,这些碑铭刻石不仅为后世碑铭文字提供了范式,而且也受到文论家的好评,如刘勰就说:“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sup>[17](P82)</sup>，“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sup>[17](P39)</sup>。

因“东南有天子气”,楚国故地成为秦始皇巡行的重点。他先后两次到过湖北,一次到过浙江,并刻石立牌于会稽山上。李斯乃楚人,又是文学大家,其出荆楚,入吴越,刻石留念,给两地的文学或多或少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并为二地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互动平台。

两汉时期的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赋,其次是散文。除此之外,还有琳琅满目的乐府歌诗和最早的一批文人五言诗。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辞赋具有“铺采摘文,体物写志”<sup>[17](P26)</sup>的文学特质,从楚辞发展演变而来。“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sup>[17](P26)</sup>《汉书·艺文志》载汉赋作家七十余人,但出生于荆楚地区者寥寥无几,而且时间都很晚。在秦汉时期的楚地名人中,至今留下辞赋作品的仅有黄香、刘驹贲、王逸、王延寿等人,作品除黄香的

《九宫赋》,笔力雄健,气势豪迈,富于想象,与屈赋的风格有相似之外,其余则均不能望屈骚之项背,也难与汉赋名篇佳构相提并论,乏善可陈。楚地在辞赋创作上沦落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令人心痛,令人深思。

令人欣慰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王逸的楚辞研究后来居上,影响巨大。王逸与屈原同乡,与宋玉同里,一生潜心研究楚辞,从而编撰出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注解楚辞作品、集汉人楚辞研究之大成的《楚辞章句》,奠定了后世楚辞学的基础。书中对屈原的生平和各篇的作者,均尽力作了考订,虽未必尽允,但对于楚辞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他对文字所作的训释多有根据,保存了许多古时资料,十分珍贵。汉人对楚辞坚持不懈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表明楚辞在汉代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确立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弘扬了楚辞艺术风范而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健康发展。<sup>[4](P294)</sup>《楚辞章句》既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又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对荆楚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sup>[19](P141)</sup>

与楚地的文学创作不同,两汉时期的越地很早就参与了辞赋创作。遗憾的是,其成就并不太高,除前期出了一些人物和作品外,大多时间也是沉寂与落寞相伴。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越地士人,仅有严忌一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有24篇,但今仅存《哀时命》一篇,收录于王逸《楚辞章句》之中。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越地第一篇文学作品。《哀时命》在表现手法上表现一般,完全模拟屈原的风格,但这恰是其独特意义之所在。学者指出,《哀时命》“接贾谊所继承的不幸文士的牢骚情绪,把《楚辞》的这种精神传下去了……因为模拟而形成风气,促进了楚风流行及《楚辞》的传播”<sup>[16]</sup>。

严助,严忌之子,善对策,富文采,与枚皋、东方朔、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人一起,深受汉武帝赏识和宠信。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严助作赋35篇。

朱买臣,会稽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喜好读书,不治产业,以卖菜为生。经过老乡严助推荐,为汉武帝讲解《春秋》和《楚辞》,受到汉武帝认可,拜中大夫。朱买臣在政事上颇有作为,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在辞赋创作上亦成绩斐然。《汉书·艺文志》载其作有赋3篇。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几人在汉赋创作上的成就虽不突出,但在传承楚辞、发展汉赋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汉书·地理志》曰:“始

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sup>[3](P1668)</sup>学者指出,王逸《楚辞章句》收录的作品,既有楚国时期屈原及他人的作品,又有西汉时期严忌、刘向、东方朔等人的作品,同时还有东汉时期自己的楚辞作品。<sup>[20]</sup>“如果说秦火以后,《诗经》是齐鲁三晋的学者所传,《楚辞》则由东南与太湖流域的学者所传。东南与太湖学者不仅传《楚辞》,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赋体,开创了一代文学的代表式样,厥功甚伟。《楚辞》汉赋在太湖的发展,是太湖流域学术楚化的重要体现。”<sup>[16]</sup>

应该指出,秦汉时期楚地虽没有产生过有影响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但“汉赋的名篇佳构无不同荆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搁笔于荆楚,或从内容和形式上‘拓宇于楚辞’,或直接以描绘荆楚的山泽之美和人文之胜为题材”<sup>[5](P142~143)</sup>。这些辞赋,风行于当时,传诵于天下,其间所蕴含的楚文化亦散播开来,势必与越文化等区域文化发生碰撞和交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这些辞赋应视为楚、越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内容。

此外,在楚、越文化交流中,还有一个人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关注。他是东汉著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邕,陈留圉人,博学多才,通晓经史、数学、天文,精辞章、音律、书画,一生所作诗赋文很多,诗、赋、碑、诔、铭等共104篇,然多散佚,完整流传至今的赋作只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释海》。

蔡邕曾游历荆楚,并为江汉朝宗的磅礴景象所震撼,挥毫写下了气势恢廓的《汉津赋》。他又曾遍访吴越,收罗异书。《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sup>[6](P1629)</sup>《后汉书·王充传》注引《抱朴子》曰:“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

我与尔共之,勿广也。”<sup>[6](P1629)</sup>《后汉书·赵晔传》说:“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sup>[6](P2575)</sup>蔡邕本是故楚地之人,以学者兼文学家身份,游楚访越,这一行为对促进楚、越文化交流的作用和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

#### 参考文献:

- [1]章太炎. 检论[A]. 章太炎全集(三)[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2]王充. 论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3]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4]蔡靖泉. 楚文化流变史[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5]张正明, 刘玉堂. 荆楚文化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6]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 [7]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 [8]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
- [9]王晓毅. 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J]. 孔子研究, 1994(1).
- [10]汤用彤.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1]汤用彤.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12]牟发松. 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3]邢培顺. 东汉初期吴越学人探论[J]. 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 [14]瞿林东. 楚人重史与长江文化[J]. 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4).
- [15]万晴川. 《越绝书》《吴越春秋》与道家思想[J]. 浙江学刊, 2005(5).
- [16]田兆元. 秦汉时期东南学术文化的演变与地域文化传统[J]. 中文自学指导, 2005(4).
- [17]刘勰. 文心雕龙[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 [18]鲁迅. 鲁迅全集·汉文学史纲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9]王齐洲, 王泽龙. 湖北文学史[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5.
- [20]田兆元. 大楚文化与大楚神话[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